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柳林风声》

褚慧玲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英国经典小说《柳林风声》延续了传统的冒险故事内核,它鼓吹好奇、探索、冒险,宣扬英勇无畏的探险精神。小说文本将冒险地域和土著动物他者化,在叙述中凸显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感,认同用文化征服异己者,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殖民话语色彩。《柳林风声》体现出了19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暗合。

关键词:柳林风声;后殖民理论;他者形象;文化征服;种族歧视;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010-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03

A Post-colon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CHU Hui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100)

Abstract: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the key meaning in the traditional adventure story is developed in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English classic novel, which is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exploring and courageous. The adventurous place and aboriginal animals become "the other" and ethnocentrism of colonists is emphasized in the narration and the view that dissidents are conquered with culture is given clear imperial colonial discourses. The coincidence betwee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is found in the novel.

Key words: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post-colonialism; the image of the other; cultural conque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mperialism

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被认为是后殖民理论的滥觞。萨义德在其后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道:“小说在帝国主义态度、参照和经验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与英法社会的扩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美学课题。”^{[1]2}他主张打破欧美文学经典,考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帝国主义话语、殖民主义与小说的共谋关系。小说《柳林风声》出版于1908年,其蓝本是肯尼斯·格雷厄姆为儿子讲的睡前故事,书中个性鲜明的动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忠厚老实、喜欢冒险的鼹鼠,热情好客、浪漫多思的河鼠,追求刺激、率真可爱的癞蛤蟆等。

然而,看似简单、温暖、纯真的故事往往容易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话语

背后隐藏着权力操作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往对《柳林风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它的成长叙事、语言特色、田园风格等方面,忽视了小说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后殖民理论为重新解读《柳林风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发现《柳林风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安排极富殖民意味,包含了殖民、暴力、种族等因素,与当时英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暗合。

一、殖民冒险与他者形象

《柳林风声》主要有三条故事线索,第一条是以鼹鼠为中心,春天鼹鼠厌倦了在家打扫卫生,不管不顾地冲出了家门,来到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新鲜刺激的河岸定居下来,与水鼠做伴。后来,鼹鼠又因好

收稿日期:2017-04-02

作者简介:褚慧玲(1991—),女,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奇,独自一人探访神秘的野树林。从野树林出来后,鼩鼠因为思家难耐,邀请河鼠和他一起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但冒险的生活对鼩鼠来说太诱人了,他最终还是受到地面世界的强烈召唤离开了家;第二条是以癞蛤蟆为中心,癞蛤蟆从驾驶马车离家到迷恋摩托车、汽车,再到跑出来进城偷车、飙车,再到后来的越狱归家,他总是不能安分地在家,几乎一直在历险的路上;第三条是以水鼠为中心,包含了水鼠到野树林寻找鼩鼠,和鼩鼠帮忙寻找水獭离家出走的儿子小波利特,后遇到赶路的航行鼠而对南方产生了狂热的冒险向往等内容。总体来说,故事情节基本符合“出走—回家—出走”的模式,整个故事弥漫着一种不安的、躁动的氛围,冒险的精神一直贯穿整部小说。

《柳林风声》虽然是一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但这些小动物除了保留了动物的面貌、形体和部分习性外,在思想情感、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和人类并无二致。除了成熟稳重的老獾,其他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群小男孩。事实上,《柳林风声》延续了英国文学中始于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男孩冒险的故事传统,主人公们都以冒险为荣,经常宣扬一种英勇无畏的探险精神。在河鼠和鼩鼠初相识的晚上,河鼠就热情地对鼩鼠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癞蛤蟆更是喜欢夸大和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曾激动地对水鼠和鼩鼠说:“旅行,变化,乐趣,刺激!整个世界都将展现在你们面前,还有马不停蹄的地平线。我想带你去见见世面,让你成为一只真正的动物。”^[2]³⁹故事文本中对冒险的尊崇与当时英国所倡导的年轻人远离家乡、勇于去征战冒险的精神相一致。而小说中的很多情节安排,如河岸动物由于拥挤都搬走了,鼩鼠这种陆地动物来到水上生存探险等,似乎成为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一种缩影和隐喻。

《柳林风声》中的故事地点可以划分为本土场域和冒险场域。在某种程度上,河岸可看作本土场域,野树林可看作冒险场域,即河岸动物的殖民地。相对于本土而言,殖民地是一种异质文明,殖民地及其土著居民是与殖民者对立的他者。当鼩鼠问及野树林时,河鼠严肃地说:“我们很少去那儿,我们是河岸边的动物。”这句话将河岸的动物与野树林的动物严格区分出来,呈现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严格对立。紧接着,鼩鼠忐忑不安地问河鼠住在野树林

的动物如何,河鼠回答说松鼠还不错,兔子良莠不齐,黄鼠狼、白鼬、狐狸等不能完全信任,都是有违动物礼仪的。在癞蛤蟆入狱后,动物对他的看法也照例分为两派:一派是河岸的动物,同情癞蛤蟆,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派是野树林的动物,说癞蛤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老獾虽然住在野树林,但显然在情感上是亲近河岸动物的,野树林的都只是害怕他、听从他,他俨然是一副殖民地统治者的形象。

作者对河岸的描述往往是美丽的、明朗的、温情的,河岸的小动物们也都是友好的、有趣的、忠诚的,而野树林往往是黑漆漆的、神秘的、恐怖的,野树林的小动物们都是不友好的、不可信任的。在鼩鼠探秘野树林的片段中,作者对野树林阴森恐怖的描绘达到了极致:两边的洞穴张着丑陋的大嘴,树枝上的蘑菇长得像漫画里的鬼脸,动物的脸都是邪恶的,目光锐利又充满仇恨。殖民者虽然用暴力征服了殖民地,但来自殖民地的敌意依然存在。河鼠是以一副殖民者的征服架势去野树林寻找鼩鼠的——腰间提着枪、手里抓着大棒。河鼠显然是入侵者的角色,但却盛气凌人、霸道强势。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考察了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作为欧洲的“他者”,东方从来都是欧洲文化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诸如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西方和反常、落后愚昧的东方这种想象和建构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3]野树林及其土著动物就处在河岸动物的想象中,处在殖民者文化的操控下,被设定为沉默的主体、丧失话语权的他者,文本的叙述始终是站在河岸动物的角度,野树林的动物都是被叙述、被污名化而无发言辩解的权利。然而,殖民地虽然被他者化、妖魔化,但是对于殖民者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小说中鼩鼠探秘野树林时心里无比害怕,却感觉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殖民者往往有意疏离被殖民者,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同时又会感到被他的统治对象所吸引。

二、种族优越感

将土著民他者化是一种话语权力运作,是种族主义者惯常的做法,即通过对他者的贬抑来提升自我的种族优越性。《柳林风声》中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塑造,不论是在外貌上、身份上还是文化上,都流

露出西方中心式的种族优越感。

鼯鼠第一次在河岸对面看到河鼠时,作者描绘洞穴中河鼠的眼睛是闪闪发亮的,像星星一样的。如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野树林里动物的眼睛在作者的描绘中是可怕的,目光锐利、邪恶。在动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往往将河岸的动物美好化,他们的面容是美丽精致的、漂亮可爱的,如水鼠、鼯鼠、水獭的儿子等,连癞蛤蟆都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河岸的动物在面对野树林的动物时,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他们眼中,野树林动物是丑陋的、愚蠢的、笨拙的、胆小的乌合之众,而他们自身却是美丽、勇敢与智慧的化身。这在水獭讲述到野树林寻找水鼠和鼯鼠的经历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到处都是被雪压断了的大树枝,几只知更鸟停在上面神气活现地跳着,好像是他们干的一样。一群野鹅,排着歪歪斜斜的队伍,在头顶灰色的天空中高高地掠过,几只白嘴鸦在树林上空盘旋,察看了一番,带着厌恶的神情拍打翅膀往家里赶。但是我一路走来,竟然没碰上有头脑的,可以打探一下消息。走到半路,碰到一只兔子,坐在树桩上,用爪子清洗他那张傻乎乎的脸。我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2]103}

野树林的动物在水獭看来都是傻里傻气、胆小怕事、不值一提的,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他那傲慢自负、高人一等的语气和神气。河岸动物还将野树林的动物贬斥为野兽,完全将其视为未开化的、不懂礼仪的生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自我优越身份的认同。

同时,河岸动物的种族优越感,通过与其阶层的结合得到了巩固。癞蛤蟆、水鼠、鼯鼠、老獾、水獭都是以中上层“绅士”自居,他们讲究礼仪、饮食、穿戴,并且有种歧视底层阶级的倾向。例如,癞蛤蟆在狱中误以为狱卒的女儿爱上他,对狱卒女儿和自己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悬殊遗憾不已,他虽伪装成洗衣妇的样子逃跑却对这个身份充满了鄙夷,而河鼠看到他穿着洗衣妇的衣服时说他磕碜、邋遢、丢人现眼。

在最后的抢夺蛤蟆宫之战中,作者将河岸动物的种族优越感推至巅峰。占领蛤蟆宫的野树林动物白鼬和黄鼠狼整日好吃懒做、粗俗无聊、寻欢作乐,

而河岸动物这边精心计划,鼯鼠事先用了一计来放松敌人的警惕,河鼠细心周密地分配武器,成熟稳健的老獾负责总指挥,癞蛤蟆在关键时刻也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四人成功潜入蛤蟆宫中,以英勇无畏的姿态投入到战斗中。而野树林的几百个动物却溃不成军、不堪一击,被鼯鼠、河鼠、老獾和癞蛤蟆四个打得屁滚尿流、仓皇流窜。在这场地盘争夺战中,河岸动物以少胜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暗示了他们在智慧上、勇气上的种族优越。到后来,一只衣衫褴褛的小黄鼠狼回到蛤蟆宫自愿为他们效劳,可以看作是河岸动物最终以暴力征服了野树林的动物,使其臣服于自己的统治的象征。

殖民者一向认为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他们给未开化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文明、光明,并努力同化土著居民。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用“模拟人”的概念来解读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行为与文化的效仿,认为尽管被入侵者对殖民者心怀敌意,但他们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野树林现在被他们整治得规规矩矩了。他们高兴地看到,野树林居民们会恭恭敬敬向他们问好。黄鼠狼妈妈会把孩子们领到洞口,指着经过的四只动物说:‘瞧!宝贝!那位是伟大的蛤蟆先生!他旁边是英勇的河鼠,一位无畏的战士。那一位,是著名的鼯鼠先生。’”^{[2]374-375}“礼仪”一开始是河岸动物与野树林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故事最后野树林里的动物也学会了礼仪,预示着殖民者对殖民地由暴力征服到文化征服的转变。毫无疑问,文化征服是殖民者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因为只有文化征服才能同化异己,实现真正的殖民统治。

三、殖民扩张与文学创作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利用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都占有了殖民地,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伴随着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外殖民扩张,关于海外历险的文学作品也随之涌现出来。欧洲最早的海外探险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占领了一座欧洲以外的岛屿,本身就表明了欧洲小说与欧洲海外扩张的共谋关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英法文化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帝国事实的种种暗示。但是,在英国小说里,帝国比任何

地方都更有规律和更经常地出现。”^{[1]83}在萨义德看来,欧洲小说与帝国主义相伴互生,小说叙事权力构成的模式与帝国主义倾向下复杂的意识形态构造之间存在并非偶然的交合。

19世纪伴随着英国海外殖民的巅峰期的到来,冒险、探险类的儿童文学读物激增,如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巴兰坦的《珊瑚岛》等。这些历险书籍有意让国内的儿童接受帝国教育,激发他们奔赴海外的热情和积极性。通过此类冒险、探险故事,宣扬了英国人对新世界的好奇、探索与控制,以及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达到了一种政治、社会效果。历险故事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在海外殖民的一种缩影。

《柳林风声》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生于1859年,他的整个成长期及主要创作期都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殖民政策的高潮时期,毫无疑问,他不可避免地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当时主流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影响。肯尼斯·格雷厄姆也自认为其创作受《金银岛》的作者史蒂文森的影响很大。“英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文本参照传统中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帝国意识或殖民意识,并在众多的浸透着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的构建下,形成了一种有时连作家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意识。”^[4]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柳林风声》问世之时又是新一轮占领殖民地的高潮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殖民话语对作者作品的渗透。

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

称,中上层阶级对于饮食非常讲究,这在《柳林风声》中多有体现,癞蛤蟆、水鼠、老獾和鼹鼠都是以有礼仪、讲道德的绅士自居,礼仪和道德也是文本中区分河岸动物和野树林动物的重要标准,即文明与野蛮的划分界限。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载体,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形成的权力话语,一定程度上也潜在地操控着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构建,正如在《柳林风声》中的土著形象大多是被扭曲的刻板形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叙述者的种族偏见和歧视。

后殖民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这些被视为经典的小说。本文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对《柳林风声》进行重新解读,依据英国实际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把对作品叙述方式和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旨在挖掘隐藏在作品内部不易被察觉的帝国主义殖民话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无所不在的渗透。

[参考文献]

- [1]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2] 肯尼斯·格雷厄姆. 柳林风声[M]. 姚佳,刘琪,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 [3] 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5.
- [4] 张中载.《印度之行》不和谐的双声: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J]. 外国文学,2000(3):40-45.

